

1900 年内蒙古西部的蒙旗教案

莎茹拉 苏德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上半年,随着义和团运动由山东向直隶、北京、天津等地发展,其影响波及到内蒙古西部地区。首先在托克托厅、清水河厅、萨拉齐厅及伊克昭盟南部的宁条梁等汉族农民聚居的地方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直隶、山东等地的义和团团员和拳师不断前来传授“神权”,并宣传“扶清灭洋”的口号,于是上述地方焚烧教堂、杀伤传教士和教徒的事件接连发生,并呈现出向周边蒙旗地方扩张的态势。清政府于五月二十五日颁布“向各国宣战谕令”,命令各省督抚及外藩王公等招民成团,“信御外侮”。清廷在宣战上谕中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挾伐,一决雌雄。”五月二十七日,又谕军机大臣等:“现在中外开衅,蒙古各盟迫近俄疆,情形吃紧。著理藩院即速传知东北各盟王公,赶紧简练队伍,筹办边防,毋稍迟滞。”随之,内外蒙古各盟旗作了一些防备俄兵入侵的部署。例如,内蒙古西部伊克昭盟盟长扎纳嘎尔迪即决定从本盟选出500名蒙兵,派往东部部署。然而,正当各蒙旗忙于防俄之时,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义和团迅猛发展起来,反洋教事件此起彼伏。一些传教士和大量的教民逃到伊、乌两盟各旗境内的教堂中,以躲避义和团冲击。于是蒙旗形势骤然紧张,各旗王公将防范的重点转向周边的洋教堂,加紧调动蒙兵,准备消灭、驱逐洋教士和教民,以“报效”朝廷。

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盟长遵照清政府的宣战上谕,令所属各旗迅速查明有无洋人居住,如有洋人居住,必须查清何人住何处、有何举动等,及时上报盟长。据调查,当时在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小桥畔、鄂托克旗和阿拉善旗交界处的三道河(后来的三盛公)、达拉特旗小淖、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铁圪旦沟、乌尔图沟等地的洋教堂中藏匿着从各处逃来的一些传教士和大量教民。随着义和团反洋教斗争的不断上升,蒙旗方面也陆续参与攻打教堂、袭击教民的行动。

义和团运动期间,在伊、乌两盟13个旗中,有7个旗发生教案。其中,伊克昭盟达拉特旗的仇教事件影响最大。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西南蒙古教区总堂萨拉齐厅教堂被义和团群众和归化城官兵攻占、焚毁,从该教堂出逃的一部分教徒来到达拉特旗小淖教堂躲藏起来。达拉特旗扎萨克贝子图门巴雅尔得知这一消息后,即派梅林章京乌勒哲巴图带兵前往小淖教堂,以备不测。六月二十八日,达拉特旗官兵抵达小淖教堂时,聚集于该教堂的百余名教民先发制人,向蒙兵发起攻击,打伤三人。蒙兵即刻进行反击,将教民“一举消灭”。虽有一洋教士出逃,不久“在乌拉特旗哈刺乌苏渡口被一姓景(音译)的汉人捕杀”。除小淖外,当时在达拉特旗后套地区的乌兰布隆、扒子布隆、诺干布日德、查干托罗该等地也居住着上百名教民。但达拉特旗方面对他们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是观望事态的发展,以便见机行事。对此,伊克昭盟盟长扎纳嘎尔迪却十分不满,他致函达拉特旗扎萨克图门巴雅尔,严厉斥责其未将各处教民一举消灭之“过失”,称这“与违抗上谕无异,或有暗通教民以图不轨之嫌”;同时饬令迅速派出官兵将该旗境内所有教堂全部拆毁,如遇有洋教士及教民,“无论蒙汉,一律肃清,不得使之四处窜逃,危害地方”。达拉特旗不得不再次调动兵马,由管旗章京朝克图瓦其尔带领,前往后套地区“讨伐异教徒”。在此次“讨伐”中,

先后杀死洋教士 5 人，教民 150 余人。至此，达拉特旗境内的洋教堂几乎全被烧毁，先后有 7 名传教士和 300 余名教民被杀死。

这时，义和团运动业已发展到陕西北部 and 伊克昭盟南部地区，部分蒙旗官兵和一些牧民也参与到反洋教行动。鄂托克旗和乌审旗的一些牧民“协助义和团，烧毁了城川、堆子梁、可布尔等地的洋教堂”。后来，从这些教堂里逃出的洋教士和教民大部分都聚集到鄂托克旗小桥畔教堂，准备进行抵抗。鄂托克旗官兵侦察得知“在小桥畔教堂内共有十余名洋教士和 300 余名教徒”。七月中旬，鄂托克旗、乌审旗和扎萨克旗三个旗派出蒙兵，与义和团团民一起包围了小桥畔教堂，开始发起进攻。但由于该教堂的围墙十分坚固，而且洋教士们都配备了洋枪，因此虽发起多次进攻，始终不能攻破该教堂。到八月底，蒙旗官兵相继接到由陕甘总督、宁夏将军等处转来的关于即刻停止攻打洋教堂的谕旨。不久，蒙旗官兵陆续退回各自旗内。据资料记载，上述三旗蒙兵和群众在参与义和团运动期间，杀死洋教士 1 名，教徒 10 名；烧毁的教堂和教民房屋，计有教堂 4 座，教民房屋 621 间；抢去的家畜共有 2000 余头（只），粮食 1300 石。此外，在伊克昭盟的准噶尔旗、杭锦旗也发生多起反洋教事件。

伊克昭盟蒙旗派兵攻打洋教堂期间，阿拉善旗也派出蒙兵，由管旗章京阿木尔吉日噶拉带领前往沙金托海、三盛公等地，先拆毁三处教堂后，包围了三盛公教堂。当时在三盛公教堂内躲藏着 15 名洋教士和数百名教徒。鉴于传教士们的多次哀求，并根据阿拉善亲王的指示，蒙兵最后放出一条生路，允准洋教士离境出走。这些传教士遂于八月初离开三盛公，由杭锦旗西部进入乌拉特地方向北行进，最终侥幸逃出内蒙古边境，前往外蒙古的库伦。传教士一经离开，阿拉善旗官兵便烧毁了天主教在蒙古西部地区的总堂三盛公教堂。

内蒙古西部蒙旗中，乌兰察布盟的四子王旗是较早且积极参与反洋教事件的蒙旗。光绪二十六年五六月间，从宁远、托克托、萨拉齐等厅逃出的一些传教士和教民越过大青山，躲进了四子王旗境内的铁圪旦沟、乌尔图沟等地教堂。据署归化城兵备道郑文钦禀报：“宁（远）厅所属之香火地，归（化）厅所属之大青山后铁圪旦沟二处，教堂较大，洋人教民齐集教堂，动辄数千百人，而铁圪旦沟闻有津古打仗受伤之洋人亦逃到该沟养伤。现在该沟挑筑壕垒，铸造枪炮，包藏祸心，逆行已露。”¹⁰当时，绥远城将军永德是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积极支持义和团运动并多次派兵攻打洋教堂的最高级别官员。他得知不少传教士和大量教民已转移到大青山以北地区的消息后，即令郑文钦带领归化城官兵前往铁圪旦沟进行讨伐。同时还致函乌兰察布盟盟长、四子王旗扎萨克郡王勒旺诺尔布，命令他“多派蒙兵巡视所属地方，遇有窜逃之教民即就地剿灭”¹¹。四子王旗遂派出 100 名蒙兵，由五名官员带领前往铁圪旦沟等处。郑文钦所率归化城官兵于七月二十八日攻占铁圪旦沟，三十日又攻取乌尔图沟，将该两处的教堂一举烧毁。据绥远城将军永德奏报，此次战斗中共杀“教匪”500 余人（铁圪旦沟 200 余人，乌尔图沟 300 余人）¹²。四子王旗蒙兵虽未及参与攻打铁圪旦沟等处战斗，但在归化厅所属赛音胡都嘎、宁远厅所属鄂都托海等地，遭遇仓皇出逃的教民，先后消灭百余人¹³。

内蒙古西部蒙旗的反洋教事件是内蒙古近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它是在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影响下爆发的，因而以往的研究把它作为内蒙古地区义和团运动的组成部分来叙述。但蒙旗反洋教事件，与汉族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是有区别的，有其自身的特点、原因以及悲剧性因素。

首先，内蒙古西部蒙旗反洋教事件的发生是蒙旗与教会之间长期矛盾的产物。

1864 年，罗马教廷正式指定中国长城以北蒙古地区为比利时、荷兰两国的“圣母圣心会

(Scheut Father) 传教区, 以接替法国遣使会在内蒙古传教。1865 年 12 月, 圣母圣心会会祖南怀仁 (Theoph V ilist) 率领韩默理 (Hamei) 等传教士来到察哈尔南部的西湾子村, 正式接管了教务。圣母圣心会接管内蒙古教务以后, 起初主要是劝诱蒙古人信奉天主教, 企图将“福音”传播给这些世代生活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人。但是, 由于蒙古人普遍信奉喇嘛教, 所以改信天主教者寥寥无几。喇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成为蒙古社会各阶层所广泛接受的一种信仰。所以喇嘛教成了阻挡天主教在蒙古人中传播的坚固壁垒。另外, 天主教的教规 (如教徒需到教堂作礼拜等) 以及它的某些近代化的传播方式, 很难适应于分散居住、逐水草而迁移的蒙古人的生活方式。1874 年, 几名传教士在蒙古向导的指引下, 来到伊克昭盟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可是经过整整 20 年的传教, 仅发展“蒙古教徒十余家”。西方传教士最终不得不将传教的目标转向进入蒙古地区的汉族移民。

19 世纪后半叶正是内地破产农民大量涌入内蒙古的时期。但汉族农民进入蒙地却为清朝法律所禁止。清朝《大清会典事例》和《理藩院则例》明确规定: “口内居住旗民人等, 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 违者照私开牧场例治罪。”“凡王、贝勒、贝子、公、协理台吉塔不囊、台吉塔不囊、官员、平人, 如将封禁牧场私令民人垦种者, 照私募开垦地亩例, 仍分别曾否得受押荒银钱, 各加一等治罪。”当时, 来到蒙地的贫苦农民, 多数属于“非法闯入”, 因而他们的处境仍很不安定, 甚至有可能被驱逐回去。他们即使能够找到一块落脚的地方, 也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生产工具等原因, 在短时间内很难顺利地从事生产。要想过上安定的生活, 移民们仍须度过一段艰难困苦的里程。

西方传教士们正是看到汉族移民的此种处境后, 认识到这是发展传教事业的好机会。他们利用蒙古地区地价低廉、土地所有权不分明特点, 从蒙旗大量租借、购买土地, 然后转租给急于得到土地的内地汉族移民, 并以此吸引他们入教。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事实, 即汉族农民只要加入教会, 不但可以得到一份土地, 而且能够获得在蒙地长期居住的“合法”身份。赤贫者还可向教会借用生产所必须的物资, 如耕牛、农具、籽种等。因此, 加入外国教会便成为内地汉族农民移居蒙地的一种途径。于是天主教很快在众多的汉族移民中传播开来, 教堂、教民数量日趋增多。1883 年, 罗马教廷将蒙古教区正式划分为东蒙古、中蒙古和西南蒙古三个独立教区。此时, 天主教教徒总数已达 14000 余名, 其绝大部分为汉族移民。

外国教会对蒙旗土地的租借、购买和非法侵占, 使草场不断缩小, 影响了牧民的生活。据记载, 至 1895 年为止, 洋教堂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侵占土地已达 1370 顷¹⁴。随着外国教会势力的不断发展, 教民人数的迅速增长, 教会与蒙旗之间, 教民与蒙民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 冲突时有发生。例如, 光绪十年三月, 在达拉特旗查干额尔格地方, “台吉参领策仁詹巴拉等人率领 70 余人, 向洋教堂发起了进攻。他们手持洋枪, 挥舞着旗旗一举摧毁了洋教堂, 使教民四处逃奔”¹⁵。事后, 在教会的压力下, 达拉特旗不得不责令参与这次事件的蒙旗官员及蒙众, 加倍赔偿洋教堂之损失。在伊克昭盟其他各旗也多次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但每次事件总以蒙方的失败而告终。教会往往凭借其特权和势力, 击败蒙旗, 索得大量的赔款和土地。对蒙旗来说, 外国教会已成为索取钱财、侵占土地的一股恶势力。义和团运动爆发后, 陕西盐池县知县向陕甘总督汇报洋教在鄂托克旗发展的情况时指出: “洋人在此传教已有多年, 向来私自越界购买蒙旗牧地, 转租于民人耕种; 还大量购买牛、马, 牧放于蒙旗境内, 大获草场之利而损害蒙民之生计。”¹⁶ 总之, 教会对蒙旗土地的不断侵占, 对蒙民的长期欺凌, 是蒙旗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对洋教士和教民大动干戈的根本原因。

其次，蒙旗反洋教事件，与当时蒙古王公忠君意识有直接的关系。自清初以来，蒙古王公与清帝之间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君臣关系。进入近代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和中国社会内部变化的驱使下，内地各省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有保守的，有激进的，更有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党人。蒙古地区，则由于闭塞、落后，对西方资本主义影响，反映十分迟缓。加之“世受皇恩”之故，大部分蒙古王公仍保持着为朝廷效犬马之劳的忠君意识。清政府发布“宣战上谕”后，东南各省督抚不以为然，拒绝执行。后来甚至炮制出《东南互保章程》，极力抵制与各国交战。蒙古地区则与此相反，对“宣战上谕”反映十分积极，各旗王公纷纷表示要与朝廷“共存亡”。伊克昭盟盟长扎纳噶尔迪向各旗扎萨克王公发出饬令，指出：“朝廷遭此劫难，我等臣仆焉能置之度外，……必当竭力相助，以示效忠。”¹⁷联军攻占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后，蒙旗王公更是悲愤填膺，奔走相告。首先由喀拉沁右旗扎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联络内蒙古东西各盟王公，号召各旗“迅速组织兵力，齐心协力，抵御外敌，以报答皇恩”¹⁸。锡林郭勒盟盟长杨桑接到贡王的信件后，即表示“该盟挑选精壮兵二千名，并报效银一万两”¹⁹。乌、伊两盟盟长也表示“齐备兵马，奋勇杀敌”。所以，与联军“议和”之后，清廷又不得不下令阻止蒙古王公的“勤王”行动，以维护来之不易和“和局”。

最后，还应指出蒙旗反洋教事件的悲剧性一面。蒙旗反洋教事件，虽持续时间不长，但其惨烈程度、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蒙旗反洋教事件，无疑具有反帝爱国的一面，但也有盲目性和悲剧性的一面，对此也应进行理性的思考。当时被杀的洋教士是否都是侵略分子，我们暂且不讨论，而大量教民的死伤，则是必须正视的史实。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到底有多少教民被杀，现在很难得出准确的数字。例如，教会向伊克昭盟达拉特旗索赔时称该旗所杀之教民人数不下800人。后来绥远城将军派人与教会方面多次磋商，核实后，实际死亡人数减至230余人²⁰。这二百余人中，究竟有多少不法之徒，不得而知，但其大部分肯定是无辜的教民。汉族贫苦农民入教，多数并非信仰所致，主要是为求得一块不向官府交纳赋税的土地，以躲避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这是值得同情的。但是，随着教会势力的扩大和教民人数的增长，蒙旗土地不断地转变为教会占有地，加快了草场的缩小。这就与广大牧民群众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利益要求发生了冲突。于是蒙民对教会产生了厌恶乃至憎恨的情绪。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蒙旗官兵以及与教会方面有矛盾的一些蒙族群众，将这种长期积累的愤恨，发泄到教民头上，才导致大量无辜教民的死伤，酿成历史悲剧。

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

伊克昭盟档案馆藏《杭锦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蒙文)1010卷，第206页。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卷82，第168-307页。

10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档案，农运类·义和团项，案卷号1862。

11 13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理藩部档案，案卷号291、291、290。

14 王守礼《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上智编译馆1950年版，第12页。

15 《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卷65，第250页。

16 17 18 《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卷82，第293、290、290页。

19 《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壬午。

(作者莎茹拉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内蒙古分公司档案室馆员；苏德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副教授 邮编 010010)

(责任编辑 王道瑞)